

朱子学上徽州

汪银辉 著



朱子學上徽州

熊禾氏題





歙县博物馆藏朱熹像



台北博物館藏朱熹像



歙县古紫阳书院

(鲍雷摄)



康熙“学达性天”匾



乾隆“百世经师”匾



歙县紫阳山

(鲍雷摄)



“程朱厥里” - 歙县篁墩 (今属屯溪区)



篁墩新安朱氏始祖朱师古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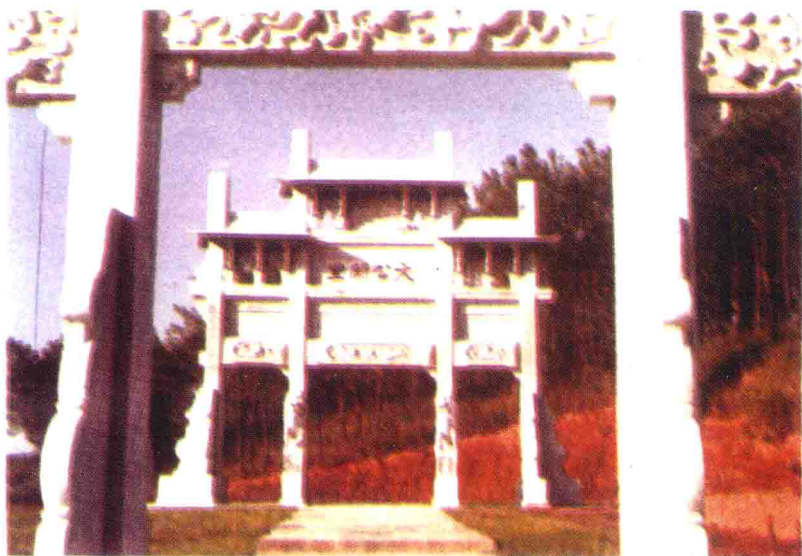
婺源朱氏茶院一世祖朱瑰墓

(何柏坤摄)



婺源文公山朱熹扫墓时自栽的古杉

(鲍雷摄)



婺源“文公阙里”石坊



婺源文公山朱氏四世祖墓

(鲍雷摄)

目 录

序	(1)
前言	(6)
1、朱学溯源话紫阳	(13)
2、教育家朱熹与徽州儒学	(19)
3、徽商与理学	(31)
4、浅谈朱熹的治学方法与徽派朴学	(44)
5、诗人朱熹与徽州诗画	(70)
6、新安医学与朱熹理学	(78)
7、朱熹理学与徽派建筑	(88)
8、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	(96)
9、朱熹生平的几点考述	(120)
附录	
1、谈新安画派的几个问题	(126)
2、走浙江道路 创自己风格 ——纪念浙江大师逝世三百三十周年	(131)
3、不愧青年训导 足资后学楷模 ——纪念国学大师吴承仕逝世五十周年	(135)
4、比马尔萨斯还早的中国论述人口问题的学者 洪亮吉	(140)

序

宋学的兴起是当时中国几代学人就中国学术进行时代转型的积极探讨，这其中的一个中心线索是传统儒学的时代化、理论化和系统化。它从北宋开始延及南宋，由周敦颐而正式发轫，至程颢、程颐奠定基础，最后是朱熹集大成，创建了当时的新儒学。之后，一直统治中国思想学术界达七八百年，影响也不仅是在中国，而是包括日本、韩国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徽州是“程朱阙里”，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之学在徽州的影响更是至深至彻。

“认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徽州是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故乡，对此，二程尤其是朱熹与徽州之间是存在双向认同的。

关于徽州人认同二程是出自徽州之说，早在明代中期以前就存在，至少是明弘治修《徽州府志》就记载休宁县城内建有程夫子祠，以祭祀程子。明嘉靖以后，则此说影响更大，并逐渐构成了徽州人共识，主要缘起是明嘉靖元年武城令赵时勉作的一篇《考新安程朱二夫子源流记》。《源流记》明确指出：“古先圣之统，自孔孟而下，一脉汇于朱子；而朱子得之二程子。人知朱子世家新安，不知程之先亦自新安而徙也。”（雍正三年重刻《程朱阙里志》卷之三。）在稍后的诸多新安程氏族谱中，对此的记载更为明确，如据黄山市博物馆藏同治歙县下门《程氏抄谱》记载：

貳百四十一号中山博野房派。……二十八世曰泽公，自篁墩迁中山博野。

貳百四十号河南房派。接博野派二十八世曰泽公之曾孙曰羽公之子三十二世曰希振公，自博野迁河南。其孙曰珣公，宋大中

大夫司农少卿上柱国，封永平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二子曰：颢、颐。而颢字伯淳，号明道，宋进士，历监察御史，追封河南伯，谥曰纯，从祀孔子庙庭，元至顺二年加封豫国公。而颐字正叔，号伊川，崇正殿说书，追封伊阳伯，谥曰正，从祀先圣孔子庙庭，元至顺二年加封洛国公。（同治歙县下门《程氏抄谱》，全一册，黄山市博物馆藏。）

这就是说新安程氏传 28 世，在唐中后期，出一个名叫程泽的人，从篁墩迁河北中山博野；至 32 世，又有一个名叫程希振的人，自中山博野迁河南洛阳，其曾孙即程颢、程颐兄弟，二程实为新安程氏 35 世孙。至于说二程对徽州的认同，被称为“新安第一书”的明万历壬子年，即万历四十年原刻、清雍正三年重刻《程朱阙里志》中就曾记述程颢有一枚“忠壮公裔”的图章，所谓“程子起伊洛，私印必佩‘忠壮’”，以此来证明二程念念不忘自己是“忠壮公”之裔，对自己是出自篁墩的认同。但此事涉嫌是徽州人的炒作，不无疑问，但雍正三年重刻的《程朱阙里志》中还记载了清康熙年间，“岁在甲午，河南翰博公佳璠来徽谒始祖元潭公、显祖灵洗公墓，叙其世系，实本新安。自两夫子祖羽公为元潭公三十一世孙，始迁居河南，今虽七百余载，而水源木本之思，依然嫡派相传也。”（雍正三年重刻《程朱阙里志》卷首。）此事当可信，因为直到 1993 年，河南程氏自称是二程的后裔，在重修族谱时，曾专门来人去篁墩寻根，当时是笔者接待的；2002 年，山东又有一支自称是二程后裔的程氏族人，亦欲重修程氏世系谱，再次派人来到篁墩，了解新安程氏世系，并多次与笔者联系，要求提供有关篁墩和新安程氏方面的资料，并寄来了一本 1987 年 5 月刊印的《河南程氏正宗世系谱》卷一的复印本。披开一看，此谱是自光绪甲午纂修以来的再修，之前历代都有纂修，其无论是世系、谱序，还是《程氏世代官秩并迁目录》、《迁徙歌》等，都是确认二程是出自篁墩，“新安篁墩祖元潭”是其程氏谱派上

溯最近的祖。《河南程氏正宗世系谱》卷一《程氏谱派及迁地目录》，1987年5月刊印。）由此可见：至少是二程的后裔们是认同徽州为自己的祖籍地的。

至于朱熹是徽州人则是十分明确的事，对此，自古至今人们都不会有争议。尽管朱熹是生在福建，主要活动也在福建，但由于祖籍在徽州，朱熹对自己是徽州人强烈认同，著述总是署名“新安朱熹”、“紫阳朱熹”；并数次回徽州省墓，每次回徽州都要从事讲学和开展学术活动，留下许多文字笔墨，有记略、谱序、匾额、诗文等。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公案：朱熹到底是两次还是三次回徽省墓？朱熹第一次回婺源省墓是在绍兴二十年（1150）春，当时他还赎归其父质田百亩，并请族中父老主供祀事。此事王懋竑撰《朱子年谱》有记载。（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四《朱子世家》。）第二次回徽州是在淳熙三年（1176）春二月，时年47岁，由蔡西山陪同，由闽取道浦城，经浙江常山、开化归婺源，遍走山岗先祖墓地祭祀，并撰写《归新安祭奠文》；与乡人子弟讲学于汪氏敬斋，为《婺源茶院朱氏世谱》作“序”，共历时百余日，至六月初旬乃去。此事王懋竑撰《朱子年谱》亦有记载。（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四《朱子世家》）问题是朱熹的第三次回徽州，一些徽州的文献如《新安学会录》、《紫阳书院志》、民国《歙县志》等都有记载：庆元二年九月（1196）朱熹67岁时回徽，并曾在府城主讲于天宁山房，参加会讲的有他在徽州的学生滕璘、程洵、祝穆和后来创办紫阳书院的赵师端兄弟等三十余人。在大会上，朱熹答问语录十四条。（汪佑：《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但《朱子年谱》、《徽州府志》均无此记载，清学者江永在《郡城天宁寺会讲辨》中还予否定，当代更是有人甚至斥骂认为存在朱熹第三次回徽的人是一种“无知”。对此，我认为，所谓历史的真实有两种，一种是某事件历史上确实发生

过的，这是真实的；另一种是某个事件也许历史上确实没有发生过，但却有人提出、记载甚至是杜撰认为发生过，则这提出、记载及杜撰的事件本身也是真实的。历史就应当是由这两种真实构成，而后者往往是更具文化探询的魅力与空间。

历史上的徽州人对朱熹及朱子思想是有着超乎寻常的认同并持续关怀的。所谓“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道光《休宁县志·艺文》。）又如清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序》中所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可见朱子的思想不仅深深影响着徽州入仕、入学、入贾之人，而且渗透到徽州民众意识之中，徽州的社会及文化就是在朱子思想的左右、指导和影响下发展与存在的，朱子之学实际上构成了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朱子之学在徽州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这也是典型性地反映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统治思想的朱子之学在民众社会影响的具体体现。但过去我们对朱子思想在徽州影响问题的探讨还是比较零散和不全面的。汪银辉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者，亦是我的老友。他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徽州，曾担任歙县文化局局长、兼任新安画派研究会会长、黄山市朱子学会常务理事。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就关注朱子之学、关注朱子的思想与徽州的关系问题，努力收集资料，持之以恒于一个专题的研究近30年，精神可佩，期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撰写并发表了二十余篇有关朱熹理学与徽州文化关系的文章，其中，就有许多篇是在我主编或执行主编的《徽州社会科学》、《徽学丛刊》、《徽学》上发表的。这些论文资料翔实，分析入微，多是掌握和运用了第一手的和学术界平常很少见到的资料，十分可贵；选题上，各篇的选题独到，努力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统一，全部的选题则全面系统，多层面、多角度地研究和揭示了朱子学与徽州社会与文化的具体关

系。这些文章都应该是极有价值的，现汪先生选其中的十余篇汇编成册，名曰《朱子学与徽州》，刊印面世，无疑是既为朱子之学的研究，也是为徽学的研究提供了一项有深度、有个性、有品位的积极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可喜可贺。惟汪老先生以长辈嘱我这晚生后学为之写序，实是惶恐汗颜，百辞不果，献此文字，权作先读此书的心得。

谨此。

刘伯山

2006年11月15日于安徽大学

前 言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公元 1130—1200），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出生于福建尤溪。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继孔子之后封建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称他与孔子一样，都是中华民族道德的集大成者。

朱熹平生不喜做官，常屡召不起，以各种理由辞免。所以他登进士第后五十余年中，“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其余时间都在著书、讲学。朱熹在漳州、潭州等地做过行政长官，颇有实绩。他六十五岁时被召入都，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但为时不长，由于政治斗争，被当权者夺职罢祠，朱熹和他的学派被诬为“伪学”，受到了很大的压制。

朱熹学问博大精深，于哲学、史学、文学、教育学、考据学、伦理学均有研究，很有造谐。所以《宋元学案》称之“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教人读书要善于怀疑：“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朱熹的最大创新，是从《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使四书成为高于五经的经典体系。他还用了毕生精力为《四书》写了许多解释和说明，具有很高的造谐。这是后来他对《四书》的解释被奉为科举考试标准答案的原因。朱熹以孔孟之道为本，继承并改造了两宋期间的主要流派，包括周敦颐、张载和程颐、程颢等各家之说，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著述最为丰富，其中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和《西铭解义》、《近思录》等。他的文集《朱文公文集》有一百二十卷，讲学语录有《朱子语录》一百四十卷。徽州是朱熹的父母之邦，朱熹生前曾二次回归徽州，到婺源、歙县省墓、探亲；讲学、授徒，回福建后又与在徽州的子弟

答问信件不断，对入闽的徽州的子弟更是循诱不倦。

朱熹的理学思想生前未被南宋统治者所认识，在他死后不久就越抬越高。南宋宝庆三年，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后改徽国公。淳祐六年，徽州府城建立紫阳书院，理宗皇帝为其亲书匾额。元朝恢复科举，以朱熹的《四书集注》试士。至正间，诏赐婺源朱子故里建“文公家庙”。明初，朝廷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并诏赐朱熹与二程的新安始祖居住地——歙县篁墩建“程朱阙里”坊和“程朱三夫子祠”；嘉靖六年，又诏赐以朱熹的婺源裔孙朱瑩为翰林院博士，后世袭延至清末。徽州是“程朱阙里”，更是视朱子为“圣人”。紫阳书院成了传播理学的圣坛，学者“一言一行必宗朱子”，“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明嘉靖年间，“王(阳明)学”进入徽州，阳明弟子王艮、王畿、邹守益、钱德洪等人齐聚徽州，并在歙县斗山、休宁还古等书院讲学。一时掀起轩然大波，“六邑之士多有就之者”。明代中叶到明末，王学在徽州与朱学受到同样的重视与拥护。清初，朝廷明令独尊理学，推崇朱熹，确立以理学为标志的儒学一尊地位。康熙、乾隆皇帝还先后亲书“学达性天”、“道脉薪传”匾额颁给紫阳书院悬挂。徽州大儒汪佑、汪德源、洪德常等人先后主持紫阳书院，招聚生徒，辨辟王学甚力。书院主讲江恒还撰有《王学类禅臆断》等书，专门批驳王学。尽管如此，王学在徽州仍有一定影响，特别是王学的崇商观念，徽州人乐于接受。到清乾嘉年间，徽州朴学崛起。朴学又称汉学，因为重历史考据，故又称考据学。朴学的奠基人婺源江永，一生笃信朱子，但又不囿于朱子之说，“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他以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在礼学、历算、音韵上的成就，开徽派朴学之先河。著名朴学家戴震、金榜、程瑶田等都是他的学生。休宁戴震治学摒弃历史上汉学、宋学之分，“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他